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三十五辑

总主编：李玉明

山西抗日女兵连

秦艳 著

抗日战争时期，山西的一批杰出知识女性，正是将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位在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事业中，积极投身抗战，成就了自身，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业绩。让我们看看其杰出代表山西女兵连的成长轨迹和光辉业绩……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西抗日女兵连 \ 秦艳著 . — 太原：三晋出版社，2010. 11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 李玉明主编. 第 35 辑）

ISBN 9787545703115

山西抗日女兵连
秦艳 著

出版社：三晋出版社

ISBN:9787545703115

定价：4.00 元

内容简介：抗日战争时期，山西的一批杰出知识女性，正是将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位在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事业中，积极投身抗战，成就了自身，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业绩。

目 录

引子\1

一、抗日烽火与山西女性\2

二、牺牲救国同盟会与军政训练班\4

三、女兵连的成立与日常训练\8

1.女兵连学员的选拔与构成\8

2.正规的连队建制与严格的军事政治训练\9

四、女兵连的抗日救亡活动\12

五、女兵连中的精英\15

1.风范永存的指导员——刘亚雄\15

2.民族女英雄——李林\16

3.人民的好干部——朱坚\18

4.宁死不屈的女战士——梁淑媛\19

5.气吞山河的女烈士——江涛\21

六、黄埔军校女生队与山西女兵连\23

七、山西女兵连的历史地位\26

附录：军政训练班女兵连人员名录\28

引子

无论在战争岁月，还是在和平年代，每个人的人生选择都积淀了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人生目标和生活履历。20 世纪前半叶，对中国民众来说是由深重苦难一步一步走向自立崛起的岁月。在这半个世纪里，中国本土发生了数次不同形式、不同性质的战争：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军阀混战、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中国人民经历了数次战争带来的切身之痛，却也在这些战争中逐步觉醒，积极参与到国家自立、民族自强的革命浪潮中。抗日战争时期，山西的一批杰出知识女性，正是将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位在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事业中，积极投身抗战，成就了自身，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业绩。让我们看看其杰出代表山西女兵连的成长轨迹和光辉业绩。

一、抗日烽火与山西女性

山西地处华北地区西部，雄踞高原群山，山峦环绕，重峦叠嶂，素有“华北屋脊”之称。其虎视华北，俯瞰平原，毗连西北，被称为“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控制了山西，就掌握了华北战场的主动权。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侵华势力进一步深入，华北地区被视为日军侵占中国的跳板。1937 年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山西作为华北的战略要地，抗战一开始即成为争夺的重要战场，成为日军首要攻取目标。9 月初，日军一路从平绥线侵入山西境内，占领天镇、阳高两县，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接着攻占大同，沿同蒲线向南奔袭。另一路沿平汉线经石家庄从正太铁路突破娘子关，向太原方向进发。在日军的眼里，攻占太原是他们最具有“战略价值”的目标。阎锡山指挥的第二战区对日军进行了抵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给予了积极配合，取得平型关大捷和夜袭阳明堡战斗的胜利。但因山西东部的娘子关天险失守，忻口中国守军腹背受敌。11 月 2 日，忻口守军撤退，保卫太原。洒满中国将士鲜血的忻口于当日被日军占领。11 月 8 日，日军又攻占太原，国民党军队受到了很大损失。其后，山西抗战进入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创立和开辟根据地、发动游击战争为主的新时期。太原失守前，在晋东南、晋西北、晋东北、晋西南，已初步形成了 4 块抗日游击区。11 月太原失守后，八路军在上述 4 个地区实行战略展开。聂荣臻率 115 师一部，依托恒山山脉，与赵振声为书记的中共晋察冀省委配合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林彪、罗荣桓率 115 师 343 旅，到晋西南地区依托吕梁山脉，与张友清为书记的中共山西省委配合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贺龙、关向应率 120 师，到晋西北地区，依托管涔山脉，与赵林为书记的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配合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刘伯承、张浩率 129 师及 115 师 344 旅，到晋东南地区与李菁玉为书记的冀豫晋省委配合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对山西的侵华日军构成严重威胁。面对侵略者的极端残暴，山西人民发扬不畏强敌、勇于反抗的民族优良传统，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把日军赶出了山西。以山西为依托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发展为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三大抗日根据地，在抗战时期，担当了在干部队伍上、后方支援上、地域扩展上输送者的战略支点，并且在民主政治、经济发展、社会生活、风俗变迁等方面，以新的价值观荡涤着旧的观念，为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以及民主国家的建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整个抗战过程中，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军事和政治地位以及经济条件，山西处于全国抗战的战略重心，是华北抗战的战略支点和中共抗战的立足点，也是日本侵略军争夺的主战场。许多影响抗战全局的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山西。山西是领导和指挥华北抗战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是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和抗日根据地的策源地，是中共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典范，也是中共主张实行全面抗战的支撑点和出发地。

任何人的命运都不可能脱离时代而独立成长，山西妇女的历史也正是如此。她们的命运与山西的大历史紧密相连，在民族危亡和社会变革中，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塑造着自己新的形象，谱写了不可磨灭的光辉篇章。

三大根据地生存、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山西妇女群体不仅自身获得成长，而且在抗日救亡中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37年夏成立的山西女兵连，把知识女性精英培养成民族战争的杰出领导者，成为各根据地和抗日战场的坚强骨干。发端于1942年，遍布各根据地的妇女纺织运动，在最困难的时期解决了军民的吃饭穿衣问题，使得广大妇女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家庭地位、人生自主能力得以提升，并深刻地影响了根据地及其解放区的民主政治生活；部分老解放区新婚姻法的制定，使妇女在生命的不同阶段有了自主选择的能力，有了择偶和离异的自由，把大批妇女从痛苦的婚姻和童养媳枷锁下解放了出来；解放战争时期的支前运动，妇女做军鞋、运送物资、肃清后方、动员参军参战，成为解放战争后方的后方，真正发挥了社会大变革时期主体的作用。纵观中外历史，战争对女性是残酷的，但战争也为妇女进步提供了机遇，女性同男性一样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也同男性一样有着展示才干的广阔舞台。中国近代历史上，从秋瑾的呐喊到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女性的命运同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始终联系在一起，妇女的解放与国家民族的独立富强紧密联系在一起，山西妇女群体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成长历程，为建国后自身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牺牲救国同盟会与军政训练班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在鸦片战争后，第一次取得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八年抗战的胜利，关键在于形成并基本坚持了以国共合作为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前，山西是在一省范围内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唯一省份。它的形成，对山西抗战、华北抗战以及全国抗战都起了巨大地促进作用。它创建的牺盟会、决死队以及战地动员委员会的形式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一无二，其辉煌战果在中国抗战历史上是不可磨灭的。

牺牲救国同盟会，是国共两党建立较早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是领导山西抗日救亡的一支重要力量，简称“牺盟会”。成立于1936年9月18日，1939年12月解散。在短短3年多的时间内，发展了300多万会员，我们所说的山西女兵连即是由牺盟会创办的军事训练班中的一个特殊连队。因此，回顾山西女兵连的光辉历程，牺盟会与军事训练班就是必须首先要了解的前提。

1931年日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后，逐步侵占热河、冀东和察北六县，并通过其驻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宁夏、阿拉善旗、额尔济旗及太原等地的特务机关扰乱后方，以配合日军向绥东进攻，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面对日军的步步进逼，山西执政首脑阎锡山出于维持自身政权的考虑，于1933年先后成立了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等团体，后又合并组成“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作为其推行政令的组织保证。但自强救国同志会成员情况比较复杂，既有进步青年、革命人士，又有主张公道团的旧派人物，且人数众多。

1935年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步伐，制造华北事变，激起了山西各阶层群众强烈的抗日激情，广大民众纷纷要求抗日救亡。“华北事变”前，阎锡山同日本的关系比较密切。1936年8月，日军进攻绥远，开始把侵略的魔爪伸到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内。面对日军的得陇望蜀以及对自己利益的侵犯，阎锡山逐步将日本作为最主要的敌人来认识。他认为“如果投降日本，不仅保不住他在山西的政治统治和经济上的全部利益，反而会戴上汉奸的帽子，成为‘千夫所指’的民族罪人。走这条路风险太大”。加之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使阎锡山当局发生了有利于抗日的转向。1936年9月，阎锡山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不过，在一段时间内他对蒋介石、日本人、共产党都是若即若离的态度，以期从中获得最大利益，维持其在山西的统治，借此时机，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内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一部分左派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开始酝酿建立新组织，发起组织抗日救国同盟会。阎锡山得知后，惧怕刺激日本人，提出改抗日救国为牺牲救国，由自强救国同志会总干事梁化之，召集杜任之、刘岱峰、宋劭文、戎伍胜、牛佩琮、张文昂、张隼轩、刘玉衡等进行研究，决定由他们发起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以阎锡山为会长，梁化之任总干事，刘岱峰为秘书，杜任之等为主要发起人，李畅生、杨贞吉、崔道修等为执行委员，于1936年9月18日万人纪念“九一八”五周年大会上，正式宣告成立。牺盟会以抗日救亡为宗旨，是以

各阶级、各界抗日爱国人士为主体的，带有群众抗日救亡民族革命大同盟性质的统一战线组织。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提出“不分党派，不分男女，不分职业，只要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一齐动员起来，积极参加一切救亡运动”的总纲领。

同年10月，阎锡山据郭挺一（名巨才）的推荐，敦请经中共营救，从北平草岚子监狱出狱的薄一波回晋，“共策保晋大业”。对此，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组成以薄一波为首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初为薄一波、杨献珍、韩钧、董天知、周仲英五人，后扩大为十六人，包括后来出任山西女兵连指导员的刘亚雄）到山西同阎锡山合作抗日和主持牺盟会工作。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公开工委）是中共北方局为促进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推动阎锡山抗战，接受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而成立的。公开工委在山西有两项主要任务。第一，初到山西即抗战准备阶段，掌控抗日民族战线的实际领导权。贯彻执行党的统战路线、方针和政策，进而准备为建立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加紧培养政治军事骨干。第二，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式成立决死队，建立新军，并大刀阔斧地发展壮大这支革命武装，充实我党的抗战实力，这是根本性的一步。

要做到这两点，就首先必须取信于阎锡山，与其建立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因此，薄一波回晋后，以公开工委书记的身份，通过接受阎锡山授予的职位，承认各种组织为山西地方组织的方法，作为党的代言人直接与阎锡山沟通。当时，阎锡山背腹受制，既要面对蒋介石的威胁，又要警惕内部分化。为摆脱困境，不得不标榜抗战，承认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不得不用共产党的方式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达到其“保晋大业”的目的。而这正是中共取得抗日运动的实权、培养干部的一个有利契机。

牺盟会名义上以阎锡山为会长，但薄一波出任常务秘书后，各部门的领导工作，已大体上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势力主持，实际上控制了牺盟会。并运用牺盟会这一合法的特殊形式的群众团体，广泛地发动群众，迅速在山西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一方面派出大批干部进行宣传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如，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牺盟会成员组织发起了“百万人签名捐款、数万人请缨上战场”的运动。签名捐款运动从1937年7月12日在山西全省范围内开展，各阶层人民群众和军政机关职员、士兵等纷纷响应。另一方面大力培训干部，面向全国招收爱国青年学生前来接受抗日军事政治训练。不仅山西各地的有志青年成群结队志愿报名，背着行装跋山涉水来太原接受军政训练，而且远在武汉、京沪、香港的一些有志青年也起而响应，千里请缨，保家卫国。牺盟会先后举办了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等13个训练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培训了两万余名干部，给该会和建立新军准备了干部条件。

1937年8月，因旧军不能适应抗战需要，遵照党的建立武装力量的指示并获得阎锡山首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正式开始筹建，计划以十个国民兵军官教导团为基础，建立四个决死总队，以太原工人为主建立一个工人武装自卫队，再建一个政卫旅。到10月，牺盟会在十个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和两个国民兵军士训练

团的基础上，成立起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四个总队（团），其中就包括军政训练班十一连的一部分女兵。同时在太原成立了工人武装自卫总队和政治保卫总队共六个团。这三者组成了一支实质上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约两万人。1938年4月之后，决死总队发展为四个纵队（旅），晋南各县的游击队相继合并为政卫一支队和二支队。在晋西北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也成立了七个游击支队。在八路军三大主力部队挺进山西后，牺盟会积极配合，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立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三大抗日革命根据地的艰难过程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39年底，这支新军已发展壮大为22个团，约六七万人，数量与阎锡山的旧军不相上下，但质量上远强于旧军。

武装力量的迅猛发展，引起了阎锡山的疑忌和恐慌，企图对局势加以控制。1938年12月，阎锡山召集军政民高级干部举行第二战区抗战工作检讨会议，作出了抗战工作检讨决议案。由参加会议的108名军政民高级干部签名，发起成立民族革命同志会，企图限制进步活动，向进步势力夺权，阎锡山亲自给该会拟定了九条公约。他确认同志会是主张公道团、牺盟会和二战区一切民众救亡团体的统一领导组织，其干部组织一是干部委员（简称干委），负一切事务的民主发动和检举、弹劾、监察之责；二是高级干部委员（简称高干），负一切事务的集中决定之责。公推阎锡山为会长，握有总裁一切的最高权力，希望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有所制约。最终，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山西“十二月事变”，牺盟会被其宣布解散。但是，原牺盟会中坚持抗日的成员，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抗日斗争。

在牺盟会举办的13个训练机构中，军政训练班是最主要的一个。训练班创立于1936年冬，设于太原市城北坝陵桥国民师范校址，最初有4个连，后扩充为12个。薄一波接管牺盟会后，领导了这个训练班，并加以整顿和改组。训练班中有比较自由的政治环境，设置了具有抗日、进步和革命内容的政治课程，并由成批的共产党员以抗日救亡干部身份出面担任教师与政工人员。事实上变成了一所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政治干部学校。

全国各地的爱国知识青年纷纷来到太原，投身军事训练班。其中有地下党组织和“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的成员，也有普通的爱国知识青年，更有一些爱国华侨学生也闻风而来。先后有4000余名青年男女知识分子，在这个熔炉里接受训练，他们除了紧张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还利用一切时机走向社会，走向工厂、学校、农村，深入到群众中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训练班的学员最后都走上了山西抗战的第一线。

训练班指导员的来源随牺盟会的发展分三个阶段：1936年8月至10月，主要由自强救国同志会派遣的阎锡山的政工人员担任；1936年10月至1937年4月，主要由薄一波派遣的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担任；1937年8月以后，各连队原有的指导员都被调往国民军官教导团工作，就从原来连队的干事中提升继任。

在训练班中，有几个连队的学员比较特殊。如六连和七连，都是红军东征时被俘的红小鬼，还有政治犯和进步青年。十一连，学员全部为女生。事实上，除

十一连外，有女学员的连队还有两个：九连与十二连，都是男女混合的连队。九连有 9 名女学员，都是女学生，1937 年夏成立。十二连组建于 1937 年 1 月，同年 6 月结业，其中女学员 16 名。十二连的学员文化程度普遍较高，党员和民先队员较多，主要是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民先介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的地下党员与进步学生，来自东北的流亡学生比例也不小，此外还有来自河南的一批学生。九连与十二连结业后，其中不少女学员又转到十一连，十一连组建于 1937 年 2 月，全部由女学员组成，亦称女兵连。

三、女兵连的成立与日常训练

1. 女兵连学员的选拔与构成

1936年，阎锡山在山西实行了联共抗日抗蒋图存的策略方针，在共产党人薄一波等人的推动和领导下，成为全国抗日救亡的中心地区，一批一批的进步知识女性，冲破层层阻挠，抛开个人的一切，从全国各地来到太原，在牺牲救国同盟会领导下的军政训练班，通过艰苦的军营生活，接受先进的政治教育和严格的军事训练，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成长为坚定的抗日先锋与共产主义战士。

1937年3月5日，在山西太原国民师范的校园里，一百多名革命女青年整齐列队，英姿焕发，隆重宣告军政训练班女兵连——十一连正式成立。

来自各地的女学员，进入连队前，一般都要经过考试，分笔试和口试两种。笔试题目有：为什么来参加训练？个人的志愿？什么是民主阵线？什么是法西斯？民主革命的对象是什么？“五一”、“三八”是什么节日等等。其目的方面是有效地了解学员的文化程度以及参加训练的动机，另一方面也借此对女学员进行政治觉悟的考核。口试主要是为了了解学员家庭情况和本人学历或职业情况。凡经各地党和革命群众组织介绍来的学员，则可以免试。

十一连从成立到结业，人数前后达190多人，学员来自全国17个省市。以山西、河南、河北、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和东北三省为最多。这些女学员，以知识女性为主体，多数是中学生，也有大学生和小学生。此外还有少数女工中的先进分子及其他阶层女性。她们大多是当地学生运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这些学员大都有较高的政治觉悟，有些已是共产党员，不少是民先队员。有些是由各地地下党组织介绍而来，有些是民先队员和学生会介绍的，有些是老党员的亲属。这些青年知识女性，不约而同地投身于训练班，有因家境困难不能升学，而来十一连求得深造；有反对包办婚姻而来十一连寻求解放之路。但更多的是为了抗日救亡、捍卫国家的理想，为了发挥自己力量、磨练自己的意志而汇集于此。

女兵连的学员们平均年龄为20岁左右，个别只有十四五岁。这群风华正茂的女学员，脱下精致的旗袍和裙子，穿上简朴的灰色军衣，腰扎皮带，打着绑腿，变为一个个英姿飒爽的女兵，不少学员还特意留影纪念。这不仅代表着形象的改变，更是身份的转换、思想的转变。在这里她们将进行艰苦的军事训练，学习进步的思想言论，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爱国教育、集体主义、团结互助、艰苦朴素的教育，在这里改造自身、完善自身，接受时代赋予她们的历史重任。青一色的灰军衣，从形式上消除了她们在出身、文化以及政治素质上的差别。共同的理想——为了中华民族的兴亡，一致抗日救国的奋斗目标，则从根本上把大家团结在一起，为了理想的实现而战斗在一起。所有女学员，以坚定的意志学习革命理论，参加军事训练。通过自己刻苦的努力，人生观、世界观得以改变，坚定了革命的斗争方向，树立了献身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随时准备投身于抗日救亡的

第一线。

2.正规的连队建制与严格的军事政治训练

女兵连完全按照陆军正规军的连队建制组建。按照军政训练班连队的序列，编为十一连。连辖三个排，一个排辖三个班，每班学员十二人。连部设连长、政治指导员各一人；各排设排长、政治工作员各一人；班设班长、副班长各一人，副班长从学员中推选。连部有书记员一人、传令兵一人。以连为伙食单位，设事务长一人、炊事员五人。

连队的领导与干部的任命遵循与阎锡山合作的原则。基本上以中国共产党负责政治教育，而阎氏负责军事训练。连队的主要政治领导人与政治工作人员都是党员与民先队员及进步青年。政治指导员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期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刘亚雄同志。政治工作员为陶恒馥（陶佩清）、戴新民、陈应春（于春）三人。陶恒馥为湖南岳阳人，于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曾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受训。国共分裂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底回国，任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长。1936年底，到山西牺盟总会工作，次年调十一连任政治工作员，时年34岁。戴新民为辽宁沈阳人，民先队员。1937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肄业。曾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由民先介绍到山西牺盟总会工作。1937年2月调任十一连，时年25岁。陈应春为江苏吴江人，是左翼进步青年。由此可见，负责政治工作的同志既有经验丰富、政治成熟的老党员，又有新生的年轻进步力量。这样，既能保证政治教育的进步倾向，又能团结各个阶层，更能满足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教育背景与政治面貌的学员的要求。同时连队的政治工作人员为年轻进步知识女性，与女学员年龄相差不多，能更有效地了解学员的思想状况，更好地宣传教育，更有利于与女学员之间沟通交流，共同促进。军事训练与生活管理由各连、排、班长具体负责，他们是从阎锡山旧军的下级军官中选拔而来。各级军官在浓厚的抗日救国气氛笼罩下的军政训练班环境里，一般都能勤于职守。

既然是士兵，首先就要在军事上具备士兵的素质。同时，革命也需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与良好的体质。因此，从建立之日起，女兵连的日常训练、生活都是遵照标准的陆军要求来实行，一切都是按照正规军的军事条例来进行。日程安排为：每天早晨六点听号音起床，晚上十点就寝。上午为军事训练，下午多为政治教育。每天两餐饭。早晨六点起床，十五分钟梳洗，然后在大操场上列队，和其他连队一起升旗、跑步。早饭后三个小时是军事操练。中午有短暂的休息时间。下午多半是政治课程，有时是政治讨论会。太阳落山时，和其他连队一起降旗、自习。自习的多数是对政治课的讨论，然后是晚点名、熄灯、就寝，一天的训练结束。每周日上午则是擦枪，这是很严格的一门课程。首先要学会步枪的装、卸，然后把零件、枪膛十分仔细地擦亮上油。最后要经过严格地检查，不合格的要返工。

每天上午的军事训练经过了三个阶段。开始的一个月的时间是在大操场上进

行的制式教练和变换队形，完全按步兵操典进行。第二月开始训练持枪扫描动作。最后一段时间则是打野外。每天早饭后，学员列队荷枪齐步走到北门外或是小东门外旷地进行班排进攻，练习各种战地动作，各种姿势的实弹射击，投手榴弹，利用地形地物，在地上摸索、滚打，以及战争中如何防御、如何进攻等。此外，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京津相继失陷。十一连正处于学习结业之时，军事训练增添了游击战争、防空救护等内容。

军事训练的要求十分严格，常常练得非常辛苦。就餐也像战斗一样。吃一餐饭，只准用15分钟的时间。主食是馒头和小米稀饭，菜很少。开始时很多女兵都来不及吃完，只好悄悄地将馒头藏在袖子里，就急忙跑去列队。一支步枪，几乎和自己身体一样高，背枪走路，枪托和腰间挂着的刺刀步步打着腿。打着绑带的两条腿，由于激烈的运动，像火烧一样疼。但大家为了能胜任将来的战斗，都咬紧牙关努力克服各种困难，认真严格地完成了各项训练课程。

政治训练采用课堂听讲，课后讨论的形式。每周四五节课，每节课两小时左右。老师为杨献珍、廖鲁言、周仲英、李培芝、刘亚雄、陶恒馥等革命前辈。其他党的领导人，如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肖克、彭雪枫、薄一波等也曾在百忙中抽时间来此讲课、作报告，受到广大女兵的热烈欢迎。课程内容比较丰富，既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的普遍原理，也有如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以及苏联“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之类的国外无产阶级思想与革命经验教训，还有中国阶级结构的分析，比如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农村社会经济的落后、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以及农民革命在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中的地位等。更有对国内革命形势的分析与论证，讲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特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动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妇女问题、妇女工作、民运工作等等。通过课堂上的扼要的阐述，加上连队政治工作人员的具体辅导、小组讨论、大会辩论等多种形式的启发与诱导，对女兵们的政治认识、理论水平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配合政治学习，十一连学委会还成立了图书室，由刘佩雄、董玉兰二人负责。她们用有限的经费，通过在太原开明书店、三联书店买一些报刊杂志及书籍外，又把学员们带来的各种书籍组织起来，供大家借阅。既有文学作品，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我的童年》、《西北印象》、《呐喊》等，也有政治理论书籍，如《列宁主义概论》、《国家与革命》、《大众哲学》、《左派幼稚病》，还有如《解放》周刊之类的进步杂志。为了保证这些珍贵的书籍不被遗失，刘佩雄和董玉兰每晚将书一趟一趟地搬回宿舍，第二天又一趟趟地抱回图书室，为了这小小的图书室，她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通过学习，使得许多女兵从朴素自发的爱国者向自觉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转化，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

不过，出于统一战线的需要，女兵们也学习了阎锡山的一些理论与主张，如“物产证券，按劳分配”、“土地村公有”、“守土抗战”等，当时的省主席赵戴文也讲过他的“活东西”。大家对这些虽然不感兴趣，但也不好不听。在这些课程之

后，党员、民先和抗先队员经常带头展开讨论，她们用革命的理论观点，巧妙地批判和揭露了这些言论的反动和欺骗群众的实质。使大家不仅对此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还学会了透过现象看本质，训练了女学员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更透彻地审视社会，认清现实。同时，也提升了女学员的思想理论高度，为她们日后参加抗日救亡及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除上课、讨论外，训练班也善于采用大家喜闻乐见的其他形式来进行政治教育。比如，邀请了全国闻名的音乐家吕骥、刘良模来教大家唱救亡歌曲。这些歌曲，在当时各连队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教育了大家，而且也鼓舞了大家的革命斗志。课外在校园里，到处都是歌声嘹亮。无论平时生活、行军、外出宣传都离不开唱歌。特别是每晚点名时刻，各连队都列队操场上，点完名，便唱起了救亡歌曲。在整个军政训练班中，上千人的歌喉响起，悲愤雄壮的歌声此起彼伏，像春雷一样滚动在校园上空，激动着每个人的心弦，久久不能平静。

四、女兵连的抗日救亡活动

在进行严格的军事政治训练之余，女兵们也进行了大量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方面，女兵们积极走向社会，深入到群众中去，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亡，培养自身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另一方面，她们更是勇敢地走向战场，参加决死队，投身于抗日救亡的第一线，用她们的实际行动谱写了抗日救亡的辉煌篇章。

到群众中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是党培养革命干部的重要一环，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体现。十一连十分重视发动学员举行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使她们走出校舍，走向社会。发动群众抗日救亡是女兵们宣传活动的重心。她们组织起歌咏队、话剧组，在革命纪念日或者假日，到街头、公园传唱革命歌曲，表演进步话剧，进行演讲宣传。每逢星期日做完例行工作（擦枪、整理内务等），便有组织地到西门外的兵工厂、钞票厂、纺纱厂、卷烟厂等地，给工人上文化课，教唱救亡歌曲，兴办业余识字班。有的还深入到工人家庭访贫问苦。通过这些活动，女兵们加深了对工人生活的理解，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有的则到市内各学校，教学生唱救亡歌曲，帮助学生排演有关抗日的活报剧，或给连队工作人员上文化课。特别是在1937年“五一”节与“红五月”纪念活动中，十一连全体总动员，大家根据自身特长，踊跃地参加各种活动。连续一个月的宣传鼓动，使整个太原市沸腾了。到处都是人头攒动的剧场，到处是激昂的歌声。为了慰问抗日前线战士和宣传抗战，十一连还组织了募捐活动。在剧场公园或者国民师范大礼堂举行义演，或三三两两到街头，向店铺、行人募捐。同时，她们又针对不同对象，向人们宣传大敌当前，只有抗日才能救国的道理。十一连还重视运用墙报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她们除平时配合学习，定期编写学习心得体会的墙报外，每逢纪念日到来，还要编写纪念专刊，把它贴在十一连的大门外边。图文并茂的墙报，受到各连学员的瞩目。

倡导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同样是女兵们宣传的重要内容。十一连刚刚组建起来不久，适逢“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到来。许多女学员都是第一次在党的领导下，公开地庆祝自己的节日，兴奋欢乐的心情难以言表，她们在海子边举行了盛大的集会。会后女兵们列着队，高唱着革命歌曲，呼喊抗敌救亡的口号，浩浩荡荡地在市区繁华的大街上游行。这次盛大的纪念活动，对每个才逃出国民党白色恐怖下的女生来说，都是终生难忘的。

十一连的女兵们还利用自己的力量积极营救被关押的共产党人以及慰问抗日的将士们。1937年初，在阎锡山的山西反省院，还囚禁着一部分共产党员和红军东征时掉队的“红小鬼”。当时，阎锡山表面上已经同意共产党的“一致抗日”、“抗日高于一切”的主张，但还不肯释放政治犯。当大家知道这一事实后，群情激愤。女兵们立即和其他连队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到反省院外，齐声怒呼“抗日无罪”、“共同抗日”。这一声援行动，配合了狱内同志的斗争，阎锡山不得不释放了全体政治犯。这些同志出来后，都参加了牺盟会或决死队，投入到火热的抗

日斗争中去。

1937年的五六月间，是十一连的军事政治训练进入学习高潮之时，也正是日本侵略者即将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际。牺盟总会决定从军政训练班抽调一部分男女学员，陆续分配到牺盟总会、牺盟中心区以及各市、县、区的牺盟会，开展抗日救亡的各项工作。从十一连抽调的有：李林、高首先、陈岱、杨稚葳、朱雅珍、刘鑫、李源等同学。她们分配到太原市区的牺盟会和各地牺盟中心区开展抗日工作。“卢沟桥事变”之后，全国人民群情愤慨，军政训练班的学员们更是热血沸腾，强烈要求抗日救国。女兵连抽调一部分女兵，到太原陆军医院学习救护、战地抢救、包扎等卫生知识，并以她们为骨干组成了“山西妇女战地服务团”，一行40余人开赴前线。此外，也相继派出一些学员参加到各种慰问团体中。比如，7月间派出张慧君、陶竞华、朱瘦铁参加由牺盟总会组织的“山西省各界赴平慰问团”，慰问英勇抗击日军的国民党军宋哲元部29军。她们在日机狂轰滥炸和被北平沦陷的险恶条件下，终于冲破重重险阻绕道天津、烟台、济南胜利返回太原。还派出杨蕴玉、陈坚等学员参加牺盟总会组织的赴绥远前线慰问团，慰问伤员，宣传抗日。再如，1937年8月25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不久，八路军奉命开往抗日前线，一列列的兵车驶进太原火车站。十一连的女兵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和其他连队一起，到车站慰问过路的八路军。当时正值炎暑盛夏，女学员们便抬着开水，带着万金油、仁丹、西瓜等，爬上兵车，亲切地向战士们问长问短，恨不得把一向闷在心里的有关红军和延安的问题，一下子问得清清楚楚。有的女学员慰问后甚至不肯下车，要求和红军一起上前线杀敌。经八路军指导员耐心地做工作，说明巩固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以及革命军人的组织纪律性，她们才恋恋不舍地下车。但是这种强烈的抗日热情却始终燃烧在每个女兵的心头，使她们在各条战线为抗日救亡发挥着自己最大的力量。

对于抗日救亡，女兵们同所有士兵一样，都渴望能走上抗日的最前线，为抗日做出自己的最大的贡献。在这种强烈的愿望驱使下，女兵们克服了重重困难，磨练自身，终于一部分女兵得偿所愿，参加了抗敌决死队，与男同志一样奔赴抗日前线。

1937年8月1日，山西新军的第一个团——青年抗日决死队（简称决死队）宣告成立。十一连的女兵们便纷纷报名要求加入决死队。考虑到女兵的身体素质，开始并没有获得批准。但女兵们毫不气馁，恳切陈词，再三请求，并以实际行动来印证自身各方面素质都能胜任的战争的需要。她们在打完野外极度疲乏的情况下，接受了领导的考验——全部绕操场跑三圈，当时的操场一圈有四五百米，但是女兵们精神振奋，忘记了疲劳，立即整齐而迅速地跑完了三圈，没有一个学员掉队，出色地通过了领导的考验。终于批准这30多人为决死队队员，编入决死第一纵队（团）二大队（营）四中队（连）三小队（排），亦称女兵排。连长胡兆琪（中共党员），政治指导员由大队教导员周仲英兼任。9月下旬，女兵排随大队开赴已是战火纷飞，正与日寇激战的平型关附近的五台前线。后来，也有部分女兵加入到决死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及其他抗战部队战斗序列中去。决死队的女兵

全副武装，每人除带一支步枪、一百发子弹、一个背包外，还带有一个干粮袋、一条军毯，只比男兵少一把铁锹、三个手榴弹。这些装备，足有 30 多斤重。而且要翻山越岭，每天行军数十里。只要勇气和决心差一点，面对这些现实，也得吓退下来。但是大部分女兵们毫无惧色地勇敢地随军前进。这种大无畏的革命勇气，的确使人敬佩。

为适应形势和工作的需要，到 1937 年 9 月下旬到五台后，女兵排正式改为随军妇女队，直属纵队政治部领导。11 月初，随总队从晋东北转移到晋东南沁县，改变为决死一纵队妇女工作队。工作重点也转为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政权，建立基层党组织，建立抗日群众团体，组建文艺宣传队等工作，更广泛地开创妇女在各种抗日工作中的广阔天地，赢得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的的爱戴。

当时，中国的农村仍处于封建思想的束缚之下，山西农村尤甚。年轻妇女抛头露面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会招致种种非议，甚至是鄙夷误解。女兵们比男同志遇到的阻力与困难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困境下，想要把工作更好地做下去，需要付出更大的毅力与勇气。女兵们既大胆又机智、细致耐心地深入到各家各户，做围着“三台”（即炕台、锅台、碾台）转的妇女群众的工作。她们关心妇女的疾苦，解除她们的困难，举办妇女识字班、夜校，宣传抗日救国，动员她们送子女参军，动员她们做军衣、军鞋，救护伤员、支援前线。在游击区的妇女，还要动员她们参与侦察敌情，给抗日政府和军队送情报，站岗放哨抓汉奸，掩护抗日军民等。女兵们还把儿童们组织起来，成立儿童团，教他们唱救亡歌曲，教他们识字，组织他们站岗放哨查汉奸，送信送情报。在女兵们的带动下，沉静的农村很快的活跃起来，到处是嘹亮的歌声，到处是蓬勃的抗日活动。她们培训了一批批的妇女积极分子，组成了浩浩荡荡的妇女干部队伍，有力地支援了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女兵们不仅出色地做好了妇女工作，在组建抗日政权，开展武装斗争方面，也发挥了她们的聪明才智。抗战初期的 1938 年到 1940 年间，女兵连先后有 14 人担任了县牺盟会特派员（后为党的县委书记）、县长，有 3 人被委任为区长。1940 年，刘亚雄担任了太行第三专员公署的专员。更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她们担任县、区领导职务，仍然保持和发扬了女兵连艰苦奋斗的本色。她们背着背包，爬山过河去上任，生活在群众中，带领群众胜利完成各项抗日任务。当敌人进犯时，她们组织游击队，打击敌人，掩护群众撤退转移。她们是群众的贴心人，群众的勤务员，她们赢得了群众的赞扬和信任。群众赞叹地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官”。参加对敌武装斗争的女兵们，有的参加了八路军的主力部队，转战于华北各地。有的组织县、区游击队，直接指挥对地武装斗争，深入敌占区袭扰敌人，保护群众，保卫生产，配合部队作战。她们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有的在战斗中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如人民女英雄李林、梁淑媛、高尔华等。她们的大义凛然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与日月同辉，永留人间。